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

青年学术论坛

Academic Forum for the Youth

(2015年卷)

海外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

青年学术论坛

Academic Forum for the Youth

(2015年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2015 年卷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 - 7 - 5201 - 1783 - 8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中国历史 - 近代史 - 学术会议 - 2015 - 文集 IV. ①K25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9438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2015 年卷)

编 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责任编辑 / 宋 超 吴丽平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49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1783 - 8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目 录

- 东南互保之余波：朝臣与督抚关于辛丑乡试展期的论争 韩 策 / 1
- 康有为、李炳宪交往和思想关系论考
- 兼及民初孔教运动跨越中韩之传播与取向问题 彭春凌 / 23
- 民国初年司法官群体的分流与重组
- 兼论辛亥鼎革后的人事嬗变 李在全 / 59
- 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的再思考（1924～1931） 李志毓 / 86
- 国立大学与国民政府
- 以抗战爆发前浙江大学校长更迭为主线的考察 张 静 / 107
- 抗日战争与华侨社会的演变
- 以新西兰华侨捐款风波为中心的探讨 吴敏超 / 132
- 英国与国民政府的战后处置计划兼及台湾问题（1941～1943）
- 以英方外交决策和报告为中心 侯中军 / 151
- 对日和约问题上的蒋美分歧及蒋之因应 冯 琳 / 173
- 近代中国英语读本印度溯源研究
- 以《纳氏英文法讲义》原本与汉译本的流布为例 邱志红 / 203
- 国族形象人格化的移植与文化困境
- 以劳瑞的“李表哥”漫画为例 海 青 / 216

东南互保之余波：朝臣与督抚 关于辛丑乡试展期的论争

韩 策

庚子事变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表现之一就是加速了科举制度变革。辛丑年（1901），围绕是否再展乡试，朝臣与东南督抚分歧巨大，经历了多回合明争暗斗。这既反映了庚子乱后当局协调稳定与变革的两难处境，又显示了新政伊始主张渐改与急改的不同趋向，更是清廷与东南督抚权力关系的微妙体现，值得认真梳理。关于辛丑乡试展期问题，目前尚无专题研究。^① 本文拟用档案、日记、书信、报刊等材料，紧扣朝臣与东南督抚的论争及士绅舆论的反应，详论展期之争的来龙去脉，并尝试从庚子西狩、东南互保的权力格局中探讨展期之争所反映的历史内涵。

一 问题的缘起：奏展乡试朝臣督抚起分歧

清朝科举时代，除非发生大规模战争等极端情况，乡、会试一般按期举行，不可动摇。有清一代导致乡试停科、展期、补考的重大变故共有三个，

^① 关晓红教授曾有所论述，意在说明当局未能把握住借暂停科举以发展学堂的建议和契机，对改科举不无遗憾（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49～58页）。惟因侧重不同，加以资料限制和解读偶偏，尚有继续探讨的较大空间。本文侧重于朝臣与东南督抚关于展期问题的明争暗斗及士绅舆论的反应，试图说明展期之争及其结局可视为庚子东南互保的某种延续。

分别是康熙平三藩、咸同时期的战乱和庚子事变。^①如果说前两次纯粹由于战事影响,那么庚子事变后的开科问题无疑夹杂着新的时代课题。此时政治格局和内外形势复杂微妙:两宫尚在西狩,北京正在议和,刘坤一、张之洞等因东南互保“有功”而权势凸显;清政府准备开启新政以挽救危局,朝野上下正在为新政建言献策,而改科举、兴学堂摆在新政首位。因此,乡试展期之争,实与科举改革、启动新政相互缠绕,关系众多士人与官员的切身利益,故成为斯时朝野关注的一个热点。

本来,庚子年(1900)光绪帝三十正寿,故开恩科乡试,辛丑年举行恩科会试,庚子、辛丑本有的正科乡、会试则递推至辛丑、壬寅(1902)举行。岂料五月二十五日中外宣战,军务倥偬。清廷遂将恩科乡、会试分别展至辛丑年三月初八日和八月初八日,正科乡、会试往后顺延,命已放的乡试考官折回。^②七月北京城破,銮驾西幸。但乡、会试开科既是朝廷仍须面对的未了之务,也是众多士人关心的功名大事。

九月十五日,留京办事大臣崑冈领衔具奏,以“明春三月乡试”困难重重,故请“俟和议就绪,再行请旨举办”。奉旨允准。一个多月后,沿江督抚刘坤一、张之洞、奎俊等奏请将三江、两湖、四川庚子恩科乡试展至辛丑年八月初八日,并照同治时先例,将正科乡试归并举行,再于壬寅春归并会试。奉旨允行。^③袁世凯经刘坤一通报后,亦奏准归并山东乡试。^④十二月,清廷索性电令各省“一律展缓归并”。^⑤于是恩科乡试因庚子兵燹再次展期。

辛丑年三月,又届题请简放乡试考官之期,各方遂展开新一轮因应。如果说前两次因军务正紧,展缓乡试尚少异议,那么此时和局将定,清廷急需借科举考试以稳定人心。结果,围绕是否再次展缓乡试,朝内重臣与东南督

① 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商志鐸校注,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第122~124页;王立新《咸同年间文闱停科问题考订》,《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187页。

③ 《大学士崑冈等奏请俟议和就绪再行举办乡试折》(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奏请将恩正两科乡会试归并举行折》(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5辑,中华书局,1996,第103~104、105页。

④ 《恩正两科乡会试请归并举行片》(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8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第91页。

⑤ 《电谕》(庚子年十二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2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307页。

抚分歧巨大。

当时中央政府分行在和留京两支。行在当局的立场是按期举行恩正并科乡试，以固结士心。大乱初平迅速开科，也正是清廷和朝官熟悉的历史经验。所以，当三月初三日陕甘总督崧蕃电询本年乡试“是否准行”时，军机处次日即给出肯定答复。^①与此同时，留京办事大臣崑冈等建议京师礼部与行在礼部分别将北京、西安两地应开列人员名单咨送军机处，“由军机处酌定省分先后，程限远近，随时开单请旨简放”。随后奉旨依议。^②西安行在中对科举事宜最有发言权的大臣，当属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孙家鼐与军机大臣王文韶。三月初九日，孙家鼐即专程找王文韶商议“本年乡试应行变通事宜”。^③同日，军机处电令崑冈尽快查明应放试差的京官名单，咨送该处。^④显然，中枢与行在礼部准备照崑冈的建议简放考官，按期乡试。

正在酝酿改科举等新政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却有不同意见。三月初五日，刘坤一向湖广总督张之洞探询再次展缓乡试的可能性。^⑤张之洞迟疑数日后主张再展一年，但建议先与军机处商妥，再电奏。^⑥刘坤一自然赞同，且更进一步希望由领班军机大臣荣禄面奏请展，因为“外间已奏展两次，此次能由内发，较为得体”。^⑦督抚接连奏展乡、会试，既不免挑战中央权威之嫌，也会得罪众多京官与士子。刘坤一虽然权势煊赫且素来敢言，但是也不得不有所斟酌。张之洞之所以建议先与军机处商妥，也是预料到朝中必有反对之声。

① 《崧蕃来电》（辛丑年三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以下简称《电报档》）第2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421页；《致崧蕃电》（辛丑年三月初四日），《电报档》第2册，第396页。

② 《崑冈等奏变通简放试差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5辑，第116~117页。

③ 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下），中华书局，1989，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九日，第1022页。

④ 《拟致崑冈等电信》（辛丑年三月初九日），《电报档》第2册，第399页。

⑤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年三月初五日午刻发，酉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以下《张之洞档》各册均载此辑，不再注出），大象出版社，2014，第323页。

⑥ 《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一日已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8556页。

⑦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年三月十一日酉刻发，戌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399页。

三月初十日，刘坤一吸纳张之洞的建议后致电军机处，商请军机大臣面奏请旨，将乡、会试再展一年。其理由如下：（1）大局未定，回銮尚难定期；（2）京师贡院被焚，今年顺天乡试势不能开科；（3）长江一带，匪徒未靖，骤聚数万人举行乡试，隐忧更大；（4）陕西、山西奇荒，直隶近畿兵燹，流亡的士民都未复业；（5）和议条款规定暂停滋事地方科举考试，但究停何处，尚未议定。^①

刘坤一所举情形虽存在，但为增强说服力，显然不无夸大渲染之处。荣禄虽与刘坤一关系密切，但就科举的看法却未必一致，更需尊重进士出身的王文韶和孙家鼐的意见。军机处如奏请再展一年，无疑推翻自己前几日给崧蕃、崑冈的答复，既不成政体，也有违既定方针。且各省情形不同，一律奏展既显草率，也将得罪望试心切的众多士子和官员。此外，乡、会试一展再展，给人留下的更是局势失控、朝廷苟且的不良印象，这是清廷此时极力要避免的。

果然，刘坤一乡、会试一律再展一年的提议被否决。三天后，清廷特下旨云：“各直省乡试，前已降旨将恩正两科归并于今年秋间举行。现在和局将定，各士子观光志切，自应仍遵前旨一律举行。著该督抚各就地方情形，详细体察有无窒碍之处，迅即据实电奏。”^②如此既维护先前谕旨的权威性，又摆出嘉惠士林的高姿态，同时也检测各督抚意见，以便做进一步决定。

督抚们反应不一。江西巡抚李兴锐愿意开科，立即“以江西教案将次办竣，民情安静，电请代奏届期举行”。^③刘坤一、张之洞却决定奏请展期。

① 《寄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十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6册，中华书局，1958，第2620页。

② 《电谕》（辛丑年三月十三日），《电报档》第2册，第404~405页。关晓红教授说：“这道上谕，一方面表明政府对士子应试心切的理解和体恤，另一方面则将是是否照前议开科的权力下放给督抚，让各地就实际情况自行决定是否举办。”甚是。但接着又说刘坤一“从清廷前后矛盾的几道谕旨窥破当道的心思，既不想举行当年科考，又不愿担当停科的罪名，以免失去士心”，却值得推敲。首先，时间逻辑有误。关教授先论述时间在后的几道谕旨、电奏，然后说这是“一道新的电寄上谕”，以致刘坤一可以“从清廷前后矛盾的几道谕旨窥破当道的心思”，其实该电谕系因刘坤一前日致电军机处而发，此时尚无前后矛盾的几道谕旨。更重要的是，谓清廷当道不愿担当停科罪名则可，谓其此时不想举行当年科考，恐与史实不符。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53页。

③ 《李兴锐电》（辛丑年三月廿一日缮递），《电报档》第21册，第515页。

十四日，刘电告张，拟约江苏巡抚聂缉槩、安徽巡抚王之春会奏请展一年，并询问张的意思。^① 袁世凯亦致电刘、张，询问复奏方略。^② 当晚，张之洞复电认为，湖北既须防票匪再行扰乱，也须防考生闹教，故“今年乡试断不能办，拟奏展一年”。张之洞还提醒刘坤一“江西应否同展，似须一询”，同时告以“湖南已电询，尚未复”，并询问袁世凯山东能否开科。^③ 十五日，刘坤一会同聂、王二抚电奏请展，并电请李兴锐奏展，又将浙江亦请展缓的消息知会张之洞。^④ 奉旨允准后，刘即于十七日通报鄂督张之洞、川督奎俊、闽督许应骙、赣抚李兴锐、鲁抚袁世凯、护理浙抚余联沅。^⑤ 袁世凯认为山东“必须和局大定，始可议及开科，亦拟请展限”，并强调京师贡院“已毁大半，明春断难会试，乐得从缓”。^⑥ 十六日，张之洞添上贡院被毁，明春不能会试，“似展缓一年于士林登进之阶，亦尚无妨”的说辞，奏请湖北乡试展至次秋，奉准后又通报相关各省。^⑦ 这是刘、张最初的串联活动。

然而，也不乏奏请按期乡试的督抚。十六日，来自西安孙宝琦的消息表明，江西、河南、甘肃均请举办。^⑧ 随后，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也奏请举行。^⑨ 有意思的是，湖南巡抚俞廉三虽似意见摇摆，却不无远见。他认为，按局势自以展缓为妥，但忧虑各省步调不齐而导致两个不良后果。一是士心不稳。考生“望试逾年，情甚迫切，如朝廷以俟回銮举行，悉展一年，

①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年三月十四日申刻发，戌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485～486页。

② 《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四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9卷，第209页。

③ 《致江宁刘制台、济南袁抚台》（辛丑年三月十四日亥刻发），《张之洞档》第35册，第169页。

④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年三月十五日午刻、未刻发，均酉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510～511页。

⑤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年三月十七日午刻发，申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564页。

⑥ 《致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五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9卷，第210页。《全集》误“始可议及”为“始我及”，已据《张之洞档》改。

⑦ 《致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六日辰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210～2211页；《致江宁、四川、福州督署，南昌、济南、杭州、湖南抚署》（辛丑年三月十七日亥刻发），《张之洞档》第35册，第184页。

⑧ 《西安孙道致上海盛大臣电》（辛丑年三月十六日辰刻发，申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539页。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68页。

士子自必安心延企。倘或缓或否，如鄂、湘人士目击滇、黔、桂、粤考官经过，则觐望倍甚，怨谤繁兴，即难保不别生变故”。二是京官、言官的态度。“况京官望试差，一若生、监望乡试，设一二省独请展缓，而言官陈奏，以为可行，辩论纷纭，更伤政体”。因此，俞廉三请示张之洞可否密商刘坤一，“密请降旨，悉展一年。或密约各省，俱请展缓”。张之洞览电赞许，认为如果“顺天、山东、三江、两湖诸大省皆不能乡试，而边省举办，亦欠平允”，更重要的是，“现正议变法，科举必须改章，缓试一年，于考生亦有益”，所以电询刘坤一可否“电商枢垣，一律展期”。^①可见，俞廉三在意的是政令统一和京官、士子的态度，而张之洞意在一律展缓乡试一年，以利其正在努力的科举改章。

不过，因几天前一律展期的提议已被否决，刘坤一了解中枢有意开科，故不愿再牵头饶舌。相反，刘氏希望“各省合力奏请，若请缓者多，纵有一二省仍请举行，朝廷必一律展缓，万无只考一二省之理”。此外，刘坤一对俞廉三担心京官、言官指摘的心理，露出不屑之意：“时局至此，但可就事论事，斟酌办理，至于京官之望差，言官之陈奏，非所敢计。”^②显示出东南督抚领袖的权势和决断。只是，刘坤一显然低估了督抚之间的分歧。事实上，仍请举行的不是一二省，而至少有七省，与奏请展期的省份数量相当。

随后，四川总督奎俊在电询江、鄂后，亦请展缓一年。福建、山东、浙江、湖南、江西亦准展缓。然湖南巡抚俞廉三的奏词颇首鼠两端：“倘各省一律举行，湖南自难独异。如沿江省分展缓办理，则湘省亦请展缓一年。”^③江西巡抚李兴锐则是迫于刘坤一压力及邻省环境而奏请展期的。^④至此，三江、两湖、四川、福建、山东等八省奏准将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展至壬寅年秋举行，而云贵、两广、甘肃、陕西、河南等七省则奏请于辛丑年秋按期乡试。直隶、山西因与议和大纲中闹教滋事地方停止科举考试五年条款关系最深，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等正与外人进行交涉，故暂未明了（各省乡

① 《致江宁刘制台》（辛丑年三月十七日丑刻发），《张之洞档》第35册，第178～181页。

②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年三月十七日午刻发，申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569～570页。

③ 《俞廉三电》（辛丑年三月廿一日缮递），《电报档》第21册，第514页。

④ 《李兴锐电》（辛丑年三月廿一日缮递），《电报档》第21册，第515页。

试情形详见表1)。所以，清廷意欲开科的立场受到局势限制，只能折中办理，政令无法统一。围绕乡试是否再次展期，中枢、礼部与东南督抚以及督抚之间分歧巨大。这种分歧格局，正是庚子东南互保的某种延续。

表1 各省辛丑乡试情形

类型	省份	辛丑乡试举行情形	正副考官
《辛丑条约》	直隶(顺天)	壬寅年八月借闈河南补行	裕德、陆润庠、陈邦瑞、李联芳
	山西	壬寅年八月秦、晋合闈补行	曹福元、杨士燮
坚持展期	山东	壬寅年八月补行	支恒荣、陈伯陶
	江南(江苏、安徽合闈)	壬寅年八月补行	戴鸿慈、黄均隆
	浙江	壬寅年八月补行	朱益藩、李家驹
	福建	壬寅年八月补行	载昌、吴荫培
	湖北	壬寅年八月补行	宝熙、沈曾桐
意见摇摆	湖南	奏请如全国一律按期举行，湖南亦举行；如沿江省份展缓一年，湖南亦然。壬寅年八月补行	李士鈇、夏同龢
	四川	有意奏请辛丑年九月补行，受刘坤一、张之洞压力而取消念头。壬寅年八月补行	毓隆、俞陛云
	江西	起初奏请举行，后因刘坤一压力及邻省环境，又奏请展至次年。壬寅年八月补行	李昭炜、顾瑗
	河南	起初奏请举行，后因筹办回銮大典奏请展至次年。又因顺天乡试借闈河南开封贡院，故壬寅年十月补行	定成、景方昶
	陕西	起初奏请举行，后因筹办回銮大典奏请展至十月举行，最终奏请展至次年。壬寅年八月补行	朱延熙、段友兰
坚持举行	广东	辛丑年八月按期举行	裴维佺、夏孙桐
	广西	辛丑年八月按期举行	李传元、伍铨萃
	云南	辛丑年八月按期举行	吴鲁、冯恩崑
	贵州	辛丑年八月按期举行	吕佩芬、华学瀾
	甘肃	辛丑年八月按期举行	饶士端、郑沅

注：(1) 辛丑年八月乡试全称为“光绪二十七年辛丑科补行庚子恩科乡试”，壬寅年八月乡试全称为“光绪二十八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2) 辛丑年八月各乡试仍用八股文（四书五经）、试帖诗、策论考试，壬寅年补行各乡试施行科举新章，皆用中国政治史事论、各国政治艺学策、四书五经考试。(3) 因《辛丑条约》禁止北京、直隶、山西五年内举行乡、会试，故顺天乡试借闈河南，河南乡试延后两月，山西乡试借闈陕西，秦晋合闈。

资料来源：据《上谕档》《德宗实录》《电报档》《光绪朝朱批奏折》《张之洞档》《清秘述闻》等材料编制而成。

按理说，东南互保各省因教案而停试的府县甚少，局势也相对安定，更具备按期乡试的条件。如果仔细分析刘坤一、张之洞奏请乡试展期的理由，可以说着眼于外省者多，立足于东南者少，内中只有票匪滋事可以作为长江各省不能乡试的直接理由，而该理由实多夸大渲染。^①况且，沿江省份湖南、江西尚有教案，但二省巡抚并不反对举行乡试，刘坤一、张之洞主政的江苏、湖北并无教案，反而坚持展期。可知刘、张不愿按期乡试必别有其故。

其实，刘坤一、张之洞之所以坚持乡试展期，是因为其“正议变法”，而“科举必须改章”。^②然而，影响重大的科举改章绝非一份奏折、一纸诏书即可了事。不仅士子需要调适准备，政务处、礼部也需要相当时间商订实施细则，并需征求督抚、学政等官员的意见。倘若辛丑年秋按期乡试，次年春会试，则正在酝酿中的科举新章颇来不及实施，八股旧科举必将再考一科，科举改章的落实就势必要再往后拖延。此时改科举摆在新政首位，需要率先推行，故科举改章的拖延，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影响兴学堂等其他新政次第展开。相反，如展缓乡、会试一年，作为士子准备科举新章的缓冲期，更利于科举新章获得通过。

所以，从发起新政角度看，这是权谋之计，能做不能说；但从清朝体制讲，乡、会试一展再展，却是极不寻常的。刘坤一、张之洞更看重改科举、行新政，而对于清廷、朝官及部分督抚来说，以下几个方面也甚为重要：庚子乱后，乡、会试接连展期对士子的冲击，外人要求滋事地方停止考试对清廷权威的损害，以及清廷急欲通过科举考试收拾人心、提振权威的迫切需要。几个月后，慈禧太后与前河南巡抚于荫霖的对话就颇能说明问题。因《辛丑条约》禁止北京五年内举行乡、会试，于荫霖说：“停科举之旨一下，天下士子皇皇，条约臣不深知，皇太后、皇上回京以后，但能开科，不妨藉河南贡院乡、会试，以固人心。皇太后曰：本来是固结人心要紧，你说得话

① “富有票”案被镇压后，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曾私下说：“南方的叛乱只是一场闹剧而已，主要是报纸借题发挥，大加渲染。……长江一带特别平静。”参见《法磊斯来函》（1900年12月18日），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以下简称《莫理循书信集》）（上），刘桂梁等译，知识出版社，1986，第191页。

② 《致江宁刘制台》（辛丑年三月十七日丑刻发），《张之洞档》第35册，第180页。

都是当办的事。”^①以故，当刘坤一、张之洞串联东南各省奏请乡试展期后，清廷和朝官集结力量向其“发难”，也就并不意外。

二 乡试万不可再展：张百熙代表朝官诘责东南督抚

庚子乱后，枢垣缺人，瞿鸿禨和张百熙则是朝野瞩目的有力候选人。有意思的是，作为翰林出身的佼佼者，两人双双主张乡试万不可再展。辛丑年三月初，留京的翰林院编修叶昌炽收到行在礼部侍郎陆润庠的私信，获悉瞿鸿禨的立场：“瞿子玖尚书到秦，言各省士气嚣然不靖，乡试万不可再展，欲分为水陆两途，以秦、晋、陇、蜀、齐、豫、滇、黔由行在乘輶而出，其余各省电简京员由轮船航海，以省材官供帐。”^②这与崑冈的建议有相通之处。至于张百熙的态度，关晓红教授已据《德宗实录》指出张氏认为“停办乡试，有碍大局。请照旧举行，以定人心”。^③惟张百熙上奏的表面理据与背后考量，支持和反对张氏的力量分野及争议所在，还可深入挖掘探讨。

三月二十六日，张百熙上奏激烈反对乡试展期，认为现在“和局大致已定，一切照常”，乡试“万不可缓”，故请“特下明诏，所有本年乡试飭各省仍一律按期举行”，借以“收涣散之人心，而励颓靡之士气”。其理由如下。

首先，展缓乡试有碍士子进身、工商生计，影响社会安定。因乡试“业经展缓一年”，士子“观光之志更切”，若再展缓，不肖者“不免觖望生事”。“穷乡僻壤，不知时局，轻信谣言，但闻乡试一停再停，必至人心惶惶，流言四起。且工商各业皆赖省会士子麋集”，销售货物，流通银钱，“一旦无故停科，不独士子无进身之阶，四民皆有失业之患，恐非国家之福也”。

其次，东南督抚借口长江票匪滋事，难以成立。其一，票匪源于广东，

① 于荫霖：《悚斋日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24），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第1263～1264页。关晓红教授已指出此点，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53页。

②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八日，第3410页。

③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52页。

而广东三点、三合等会更是防不胜防，但张百熙自称庚子前后在广东“学政任内，按部考试，并无窒碍”。其二，咸同年间，局势更糟，但只要有“一隅安堵”，即照例考试。“虽当贼氛甚炽之时，而开科各省仍复帖然如故”，曾国藩“甫克金陵，首行乡试，实见及于此”。故“藉考试可以收解散之益，未有因考试而反贻滋蔓之忧者”。其三，“如谓票匪可虑”，则各省防军虽“不足扞御外人，岂并不能弹压内地。况此类匪徒名目，自嘉道以来即已无地无之、无时无之。若如该督抚所陈，是票匪永无净绝之时，即乡试永无举行之日”，恐士民失业而流为匪类，票匪益多，各督抚更将无所为计。此外，“乡试人多易杂，稽察为难”的说法也站不住脚。因为各省童试人数也不少，并有较乡试加多者。“若以乡试为必不可行”，难道也令各省学政一律停考正在进行的童试？

最后，张百熙从庚子乱后国势、民心、士心的高度发论，谓国势强弱视乎民心从违，民心从违视乎士心向背，故从来没有“防其士之为乱者”，也没有“因一二人不肖，而遂波及千万人者”。即此次拳匪滋事之处概行停考，“尚且分别城镇”，既非“合数省而停之”，也非一省全停，甚至无一府一县全停者。进而，张百熙以代朝廷的口吻责问东南督抚道：“乃以风闻之富有余党，转更甚于有据之义和匪徒，以无事之东南，转更甚于有事之西北。是直令天下士子之心不重为票重为拳，不但驱之为潜图滋事之票匪，且将托名为明目张胆之拳匪矣。各督抚其何术以弭之？朝廷亦将何术以弭之哉？”^①

如前所述，票匪滋事更多是借口而已，故张百熙的诘责无异于点了刘坤一、张之洞的穴位，宛如说东南督抚借机渲染，意图“欺君”。折上当日，清廷即下电旨，称“本年恩正并科乡试原应一体举行，展缓本非不得已”，故令东南督抚再行详细体察本年可否照常乡试，迅速电复，并将张百熙原折抄寄阅看。^②

此时，瞿鸿禨和张百熙既是军机大臣候选人，前不久又分别卸任江苏学

① 以上几段均见《都察院左都御史张百熙奏停办乡试有碍大局拟请照旧举行以定人心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5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1744~1746页。

② 《电谕》（辛丑年三月二十六日），《电报档》第2册，第423、424页。

政和广东学政，途经大半个中国来到西安，可谓既了解东南局势，又熟悉各地士子动态。因此，他们的意见清廷当然重视。进言之，在瞿、张背后，实际上还有一大批期待试差的京官反对乡试展期，这些京官背后又有更大一批士人，期待借科举考试谋事。三月初八日，京城风传考试一律停办五年，翰林前辈朱益藩言下即有“不豫之色”，据叶昌炽说，内阁学士秦绶章“则必怒于言矣”。^①翰林院编修伍铨萃庚子已放云南乡试考官，因奉旨展期，遂折回广东探亲，这时已奔赴西安。三月二十日，伍氏曾拜访张百熙，随后又在给梁鼎芬的信中议论“东南停乡试”。^②

更重要的是，孙家鼐、王文韶等当朝重臣均反对东南督抚奏展乡试。消息灵通的袁世凯很快得知“寿州（指孙家鼐）主此议”。^③随后刘坤一得到的情报表明，“奏展乡试，寿州、清河（指王文韶或陆润庠）均不谓然”。^④事实上，就在张百熙上奏前一日，他与瞿鸿禨先后拜访王文韶，^⑤不可能不谈及此事。此外，以张百熙与荣禄的密切关系，上如此重要的封奏，很可能事先已经荣禄首肯。这就部分解释了为何清廷刚允准东南各省乡试展期，几天后突然因张百熙一道奏疏，便又命东南督抚再议复奏。

因此可以说，张百熙上奏反对展缓乡试，不仅仅是一己之见，也不仅仅是其与瞿鸿禨的共识，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进士出身的朝官群体的意志。该群体上自大学士、军机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礼部堂官，下逮翰林院编修、检讨、部院司官。科举制度带给这些进士（特别是其中的翰林）出身的朝官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情感利益，其反对展缓乡试实属必然。相对而言，东南督抚与科举考试的利益纠葛要少得多，这也是其坚持乡试展期的原因之一。故而，张百熙洋洋千言的激烈奏词，实乃朝官群体对刘坤一、张

①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八日，第3410页。

② 伍铨萃：《北游日记》，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39），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影印版，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二十四日，第199、203页。

③ 《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电》（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已刻发，申刻到），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9卷，第559页。按，编者系于四月二十八日，疑误。

④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年四月十二日未刻发，申刻到），《张之洞档》第87册，第258页。“清河”有可能借“清河王”指王文韶，也可能借西晋陆云的《陆清河集》指礼部侍郎陆润庠。

⑤ 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下），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第1024页。